

讀了關於博鰲論壇“政府與市場－新環境：新思考”分論壇嘉賓發言的報道。總的感覺是，如果大家總是被初等問題和幼稚見解拖着走的話，實在是浪費時間。

辦這個論壇要不少錢，嘉賓們從世界各地趕來與會也要不少時間，結果來到會場後，還是不得不和中國某些經濟學家們在教科書的水平上討論關於市場中國企的功能和政府的作用，成本也太高了。

歸納一下中國的自由市場經濟學教科書要點：

第一句話——中國經濟的成功，就是政府作用越來越小、國有部門越來越小、市場自由越來越大的結果。

第二句話——中國經濟若要繼續成功，就要繼續自由化、放鬆管制、縮小國有部門；只有市場才是最有效率的，國企就是市場的對立面，就是壟斷、特權和腐敗的代名詞。

第三句話——中國如果不這樣做，就不能稱為市場經濟；中國的經濟學家如果不堅持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就不能叫做經濟學家。

至少有二十年了吧，此派人物的這套“三句經”從來不變，永遠不變。

他們剛從海外留學回來時這麼講，目睹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現實後也還這麼講，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後仍然這麼講。就好像對於自由市場造成的禍害什麼也沒看見，連危機後涌現出的最新經濟學觀點也都充耳不聞。

想象一下這樣一個情景：某位當代學者宣稱，我是一個堅定的亞里士多德主義者，我堅持用亞氏的形而上學哲學看待世界，堅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萬物由土水火氣四大元素組成，無論是牛頓力學還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都和我無關；因為如果一個國家不堅持形而上學，它就不是一個亞里士多德國家，而一個學者不堅持形而上學，他就不是個真正的亞里士多德主義者。

假如博鰲論壇上突然冒出這麼一個人，大家會作何反應呢？我看最好的辦法就是找一件古希臘人那種大長袍給他披上，然後買一張前往雅典的單程船票，送他踏上朝聖之旅。

其實，我們這些可敬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們與這位當代亞里士多德主義者又有什么兩樣呢？

但凡有些基本判斷力的學者都會明白，自從保羅·薩繆爾森成功將經濟學科學化、物理學化、數學化之後，這個所謂的新古典經濟學就已

編者按：我在2011年9月在中國重慶參加世界華文媒體論壇大會時，認識了一位《新西蘭聯合報》社長兼總編文揚先生。他經常向本報提供他的好文章希望與伊利華報讀者分享。文揚1957年出生於北京市，系統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以往經歷包括：中國海軍軍官，諮詢公司總經理（北京），投資公司執行董事（新加坡、香港），華文報社主編（新西蘭）和自由寫作者，出版物包括四本文揚文集和一本專著《中國力》。浦瑛



作者：文揚

偽經濟學已成改革阻力

徹底成爲一個脫離實際的空中樓閣了。無論它這個理論樓閣多么精美，多么接近物理學的形式，多么符合數學家的口味，都不能因此而證明它就是對於人類社會經濟現象的最終把握，更不能以此作爲實際經濟活動的指導。

這套理論可以越來越科學化、精細化，可以讓無數天才的頭腦沉溺其中流連忘返，也可以自說自話地推舉出一個又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都沒有問題。但是，它仍然不是關於真實經濟活動的成功理論，而是一個偽理論。

那些只懂得從這套偽理論出發看待所有問題、解釋所有問題的經濟學家，凡事都要講“囚徒困境”、“理性選擇”、“多方博弈”的經濟學家，無論理論功底多么深，數學水平多么高，也仍然毫無價值，是學術上的原教旨主義者。

其原教旨程度最極端的表現，恐怕就集中在中國這些經濟學家們身上了。二十多年一字不變地重複同一套昏話，真和祥林嫂阿姨有一比！

對於主流經濟學的偽理論性質，在過去只有卡爾·波蘭尼、羅素、愛因斯坦等少數大師從理論上指出過，但他們那一條透亮的溪流，很快就被薩繆爾森等人掀起的倒灌狂潮淹沒了。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在全球被翻譯成41種語言，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總計銷售出400多萬冊，被稱爲“世界通用的經濟學語言”。在這種“經濟學帝國主義”的高壓之下，誰還會記得

波蘭尼他們都說了什麼？值得一提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位在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薩繆爾森的學生和猶太同鄉，比任何人都更有理由成爲堅定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甚至原教旨主義者，但面對赤裸裸的現實，他最終走出了偽經濟學的陷阱。

2001年再版的波蘭尼《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一書中，有他寫的一篇序言，他說：“然而，今日學術界已無人會支持自律性市場必導向高效率且均勻的資源分配這一論點，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場機制不完整的狀況下（這可以說是全球常態），國家的干預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資源分配的效率。時至今日，吾人已能採取較爲公允的立場，即承認市場的力量與限制，以及政府在經濟治理上所扮演的必要角色。”

顯然，中國的偽經濟學原教旨主義者們，遠遠沒有人圍他所說的“學術界”和“吾人”，因爲他們決不能承認政府干預可以“有效改善資源分配的效率”，一旦承認，他們的江湖地位、既

【多維新聞】在日簽署漁業協議後，馬英九對日本的感激溢於言表，其手下更是通過表示“將驅逐大陸船隻”來向日本獻媚。對於馬英九政府的此舉，多維新聞之前就透露大陸高層對其大爲不滿，現在更有輿論稱其爲民族罪人。雖然馬英九拒絕兩岸聯手保釣有歷史和現實原因，但他這次爲獲漁利而“刀插”大陸的做法，令大陸民眾心寒。而馬英九這種向日本諂媚的表現，也使大陸高層認爲其有損民族大義，喪失民族氣節。前國台辦主任王毅之前就曾講，兩岸保釣不同步將愧對列祖列宗。但若數典忘祖，背棄民族大義，最終必將遭到全體中華兒女的唾棄。對馬英九此次表現，只能說他是算計不明，因小失大，真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馬拒聯手保釣有淵源

自2012年釣魚島之爭爆發以來，大陸方面在應對釣魚島局勢之際，多次呼籲台灣方面合作保釣，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曾用“兄弟鬩于牆，外御其侮”來表達“保釣”是兩岸共同的責任。但對兩岸聯手，馬英九政府則以“不與對岸一起處理”來回應，並在多個場合強調，兩岸不會合力保釣。

對於馬英九政府多次表示“拒與大陸一起保釣”的表態，既有兩岸分治的歷史原因，也有美日壓迫的現實周邊環境所致。畢竟，自兩岸分治以來，雙方長期敵對，時有衝突。隨着蔣經國推動“政治革新”艱難地開啓了兩岸交往的大門後，兩岸開始交流。但好景不長，隨着台灣解除“戒嚴令”，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後，台獨勢力的崛起又令兩岸關係再度緊張，雙方劍拔弩張，更有“台海導彈危機”致島內社會人心大亂。

直到2005年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爲兩岸關係發展揭開了新的一頁。之後大陸實行“對台新政”，國、共兩黨聯手促使兩岸關係正常化。隨着國民黨再度執政，兩岸關係才算真正穩定下來。

不過，國民黨重新執政至今不過四年有餘，而四年的影響顯然無法和六十年來的對立相提並論。整個台灣社會對大陸既有受歷史影響的擔心，也有對未來不確定感的憂心。在此背景下，台灣上下瀰漫着“求援”心態，而假如未來兩岸發生衝突，能夠對台灣施以援手的除了美國，也就只有日本有“興趣”、有能力了。

故而，在保釣問題上，馬英九政府既要維護美、日關係，又試圖維護兩岸關係，在處理保釣議題上既不能得罪美、日，也不能與大陸交惡。不過，馬英九政府的作爲其實也是有台灣民意背書的，儘管由於日本的挑釁，台灣民意支持兩岸聯手保釣的比率已經突破半數，達到54%。但長期數據來看，過半台灣民眾還是不支持兩岸共同保釣。

除此之外，在野黨民進黨的強烈反對也是國民黨必須考慮的因素。特別是民進黨、台聯黨一直都聲稱在釣魚島問題上，台灣不能和大陸站在一起來挑戰日本，挑戰日美安保同盟。而這些人的表演，更是令馬英九政府難堪。

對馬英九政府而言，兩岸聯合保釣政治色彩過於濃厚，而且短時間內難有成果，只是一項“必須且迫不及待”的事，故此，執政不力的馬英九也該是寧可少一事也不願多一事。

但他近期的表現卻並非如此，不但

得利益甚至那個不便明說的“政治前途”，就都沒了。

斯氏的文章中也提到了這一點，“誠然，其中有些學者虛偽且易辨識，就像那些依照意識形態或特殊利益的需要，而自詡爲真正的經濟科學者及優良政策者的那些人。”

他還說，“經濟學與經濟史學界都已認可波蘭尼中心意旨的正確性。但公共政策，尤其反映在華盛頓共識中認爲發展中國家及其經濟改革應如何達成巨變的政策，卻對此視若無睹。如前所述，波蘭尼揭發了自律性市場的神話，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場。即便是今日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在其轉變過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積極的介入角色，不但以關稅保護其工業，也保護其新興科技。”

這似乎意味着，我們這些祥林嫂們也不能算是“經濟學與經濟史學界”中人，他們怎么能承認“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場”呢？這不是等於說“阿毛”從沒被狼叨走嗎？

“假若波蘭尼今天撰寫本書，將會有更多證據支持其結論。譬如，在當今世界發展最快速的東亞地區，政府都扮演中心角色，明確或隱微地表明保存社會和諧的重要性，不止保護社會與個人資本，同時更加以提陞。在此區域，不但可見快速經濟成長，也同時可見貧窮明顯減少。假若共產主義在蘇聯和東歐的失敗，證明市場制的優越性勝過社會主義，那麼東亞的成就也充分證明，一個政府積極參與介入的經濟體，絕對優於自律性市場。”斯氏就是在對中國經濟學界說的。

這樣來看，中國偽經濟學的原教旨主義者們至少落後斯蒂格利茨10年，至少落後波蘭尼70年，這樣一些腐爛的思想，除了成爲中國改革的阻力，或者把中國推向歷史歧途的斜力，還有什麼其他價值呢？

文揚 2013年4月8日

沒有冷處理，反倒是頻頻高調發聲，令平穩向前的兩岸關係時常出現波折。

馬英九撿芝麻丟西瓜

其實對於兩岸聯手保釣，大陸方面的態度一向都是積極的。從范麗青用“兄弟鬩于牆，外御其侮”來表達“保釣”是兩岸共同的責任；到楊毅在1月30日表示，如果數典忘祖，背棄民族大義，最終必將遭到全體中華兒女的唾棄。不過，馬英九似乎與大陸做對一般，他在2月18日說明瞭兩岸不能聯手保釣的三項理由，馬英九表示，第一在法理基礎上，大陸否定“中日和約”，“讓我們不知道怎麼合作起”；第二、台灣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大陸至今沒表示任何意見；第三是漁業議題，大陸不希望台灣與日本對談時觸及主權議題，但“沒有主權，哪裏會有漁權？”台日不可能不觸碰主權議題。

就在馬英九提出所謂的三項理由後，台灣巡邏船就向大陸海監船“宣誓主權”。之後台立法院的“台日國會議員友好協會”多名立法委員還赴日本澄清兩岸絕未聯手保釣，建議日方盡速與台簽漁業協議，才不會讓中國大陸有見縫插針的機會。

對於馬英九政府在表現如此抗拒，大陸方面依然是在喊話撫慰。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4月10日就表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在捍衛主權的基礎上維護兩岸漁民在這一傳統漁場的漁業權益，是兩岸雙方的責任所在。顯然，大陸是希望馬英九政府在漁業問題上仔細思考，不要因貪圖蠅頭小利而做出有損民族大義的事情。

不過，日本於4月10日與台灣簽署漁業協議，馬英九對此是深感欣慰。台海巡署王進旺更表示，若有中國大陸漁船進入釣魚島水域，台方會“依法取締、驅離”。馬英九政府此舉如同向大陸狠插一刀。特別是在大陸剛勸說馬英九不要貪圖蠅頭小利而做出有損民族大義的事情不久後，馬英九此舉傷害了兩岸民間感情。而他在獲利後的媚日言行，更令大陸高層不滿，甚至視其爲民族罪人。

之前，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在訪日時就釣魚島的言論遭到大陸狠批，而馬英九此時此刻的表現，在大陸看來與蘇貞昌並無二致。聯想起馬英九青年時期的保釣舉動，他當下與日本合力的舉動，讓大陸感覺馬英九這是對中華民族氣節的背叛。就像前國台辦主任王毅此前所講，兩岸保釣不同步將愧對列祖列宗。但若數典忘祖，背棄民族大義，最終必將遭到全體中華兒女的唾棄。

北京：馬英九背棄民族大義

“中國夢”的奇耻大辱！



於需求短時激增對其市場造成巨大衝擊，導致人家國家嬰兒有斷奶之虞。於是，包括中國香港地區在內，這些標榜自由市場的民主國家和地區，連自己信奉多年的價值觀都不要了，接連推出極富創意的奶粉限購政策。德國最大的日用品連鎖店DM以及ROSSMANN等大連鎖店在奶粉櫃臺貼告示稱，“每位顧客最多只能買3包奶粉”。近來，DM超市的限購規定又“升級”，不但限購3包，還要求出示孩子的身份證明或帶着孩子才能買。在澳大利亞，各大商場、藥品保健品店

聯合採取保護自家嬰兒行動，每人每次限購4罐嬰兒奶粉。店內監控系統將收集到的數據輸入收銀系統，24小時內超量或反復購買者，電腦拒絕通過。當地郵局提高了郵寄費。現在，寄奶粉的價格基本上與奶粉價格相當，如果加上保險費，比奶粉價格還要高一些。

雖然沒有明示，但這些政策針對中國人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外電說，中國對外國奶粉的需求量“大得可怕”。

對於舉世公認的世界工廠，對於一個主流媒體每天唱響中國夢的國度來說，這是一個巨大國耻，令人無地自容。

正當中國消費者信心盡失，紛紛淪爲驚弓之鳥之際，來自蘇州的美素麗兒利用過期原料加工奶粉的醜行被媒體曝光，又完成了致命一擊。儘管洋品牌難辭其咎，但這場悲劇的始作俑者是中國人，發生地是中國，因此成爲中國更多人奔赴海外搶購奶粉的加速器。

畢竟，對於雲集着成百上千的奶粉企業和數以萬計的原料供應商的中國而言，即使是官方公佈的4%的不合格率也已是個無比可怕的警鐘。

國務院新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日前吐槽說，自己有個4個月大的孫子，也需要吃從香港代購的奶粉，自己也是“限奶令”受害者，呼籲香港人與內地人要換位思考，互相體諒。這有些哀怨的話語至少透露出兩個信息：第一，相當多領導的孫子沒有民間想象的特供奶粉可吃，第二，相當多領導對中國國產奶粉也極端不信任，與廣大人民群眾同氣連枝。

截至2012年年底，中國嬰幼兒達到1.08億，如今焦灼的家長們紛紛轉向海外搶購奶粉，雖然能對西方擴大內需產生積極效應，但也由

於需求短時激增對其市場造成巨大衝擊，導致人家國家嬰兒有斷奶之虞。於是，包括中國香港地區在內，這些標榜自由市場的民主國家和地區，連自己信奉多年的價值觀都不要了，接連推出極富創意的奶粉限購政策。德國最大的日用品連鎖店DM以及ROSSMANN等大連鎖店在奶粉櫃臺貼告示稱，“每位顧客最多只能買3包奶粉”。近來，DM超市的限購規定又“升級”，不但限購3包，還要求出示孩子的身份證明或帶着孩子才能買。在澳大利亞，各大商場、藥品保健品店

聯合採取保護自家嬰兒行動，每人每次限購4罐嬰兒奶粉。店內監控系統將收集到的數據輸入收銀系統，24小時內超量或反復購買者，電腦拒絕通過。當地郵局提高了郵寄費。現在，寄奶粉的價格基本上與奶粉價格相當，如果加上保險費，比奶粉價格還要高一些。

但這些刁鑽的禁令依然不能阻擋中國人千方百計搶購奶粉的熱潮。就奶粉而言，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要想維護中國消費者利益，重建其對國產品牌的信心，洗刷這一震驚世界的新型國耻，首先要喚醒所有奶粉乃至食品生產加工銷售企業的良好，加強行業自律，畢竟，少數害群之馬的存在已經影響到整個行業的生存，該猛醒了。

其次，伴隨着李克強總理新四化的提出，農業現代化成爲推動新型城鎮化的主要動力，這標誌着整個農牧業的產業等級、規模化、集約化生產迎來機遇。至少在東部沿海地區可以先行先試，爲中國綠色農業時代探索經驗，同時極大地降低監管成本。

隨着大部制的啓動，成立了新的食藥監總局，儘管尚不能徹底理順現行監管體制，但至少向着責權明確、科學管理邁進了一步，爲徹底形成垂直統一的監管體制打下基礎。

要想真正迎來中國奶粉的放心年代，關鍵還是要完善法治，深化改革，推動政府依法行政，並在此基礎上加大對違法企業的懲處力度——經濟上讓其傾家蕩產，刑律上讓其不敢越雷池一步。

但這都需要時間。希望掙着非洲人民工資、喝着比美國還貴的奶粉的中國消費者靠自己如此艱苦的跨國搶購能加速這一歷史進程。孩子是未來，是希望，他們等不起。

